

张宗原 著

意在言外 名人名言的读法

東方出版中心

说实话，除了少数几条古代名人名言之外，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少年阶段几乎没有将绝大多数的古训太放在心上，尤其是老庄和孔、孟的语录体文字。因为无论从当时学校的思想教育课上、教科书里、或者社会主流媒体的宣传中；还是在所读书本的字里行间，不由得我们不得不出这样一个结论：老庄哲学「是我国古代奴隶主思想的代表」，注定是消极颓废的东西；而孔、孟的思想，则代表着主导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必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腐朽的东西，是思想桎梏。在于笔者个人，在幼时只有在受曾读过几年私塾的母亲教诲的时候，偶尔还能听到几句孔孟的古训；有的时候突然感受到它们对

张宗原 著

意在言外

名人名言的读法

东方出版中心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说实在的，除了少数几条古语，我们从小就听惯了。在
广大的青少年阶段几乎都未曾将绝大多数
人放在心上，尤其是老庄和孔、孟的语录体
文字。因无论从当时学校的思想教育课上，教科书
会主流媒体的宣传中；还是在所读书本的
前，不由得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老庄哲
古代奴隶主思想的代表，注定是消极颓
废孔、孟的思想，则代表着封建社
想，一是必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一
是思想桎梏。在于笔者个人，在幼时
只有在受罚或过几年枯燥的毕业教海的时候，偶尔还
能听到孔孟的言词，有的时候突然感到它们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在言外:名人名言的读法 / 张宗原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3. 1

ISBN 978 - 7 - 5473 - 0546 - 1

I. ①意… II. ①张… III. ①古汉语—格言—汇编
IV. ①H13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3650 号

意在言外:名人名言的读法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 -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40 千

印 张: 6.25

印 数: 0,001 - 3,100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546 - 1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52069798

自序

说实话,除了少数几条古代名人名言之外,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少年阶段几乎都没有将绝大多数的古训太放在心上,尤其是老庄和孔孟的语录体文字。因为无论从当时学校的思想教育课上、教科书里或者社会主流媒体的宣传中,还是在所读书本的字里行间,不由得我们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老庄哲学“是我国古代奴隶主思想的代表”,注定是消极颓废的东西;而孔、孟的思想,则代表着主导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必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腐朽的东西,是思想桎梏。至于笔者个人,幼时只是在曾读过几年私塾的母亲教诲下,偶尔还能听到几句孔孟的古训,感受到它们对心灵的冲击,然而最终也并无深究。

通过“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我进入复旦中文系学习,以古典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由于以后一直在高校执教,到了临近四十岁时突然感悟,如果不补上传统文化和了解各个时代文化大师思想菁华的课,要获得研究古典文学的深度,简直是不可能的。于是,开始较系统地浏览诸子百家著作,或追寻古代名人名言的出处,一边学习,一边教书,写一点文字。我学习先秦诸子与古代名人名言的目的,原本如此。

这样的学习动机和状态,使我自行摸索着进入中国古代哲学

领域。起初,大致不受任何门派或“家法”的拘束与掣肘,只管埋头读来,因此也没有任何先入的成说与桎梏;接着才寻求近现代国学大师们的各种观点来纠偏和补充,后来还倒过来猜度和品评他们谁说得更能惬我意。选择这种方法来学习是一种无奈,只是从原著和一些原始材料入手,去反复阅读、体味与思考。当然不免走些弯路,但“撞墙碰壁”以后,却懂得拐弯,还努力总结出自己的学习方法来。

在学习过程中,回想起几十年生命中经历的社会潮流与个人的风风雨雨,很多事情都被这些古代哲言应验(或徐缓地证实被“言中”)了,深为震撼,由衷地服膺其中一些名人名言的真理性。只因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自然地积累了不少资料,深感弃之可惜,便以向学生“献芹”的心情,在两所大学先后开设了《中国古代名人哲理》这样一门选修课。其宗旨,我归之为“历史俯角,总览全局,妥善去取,为我所用”。一开近二十年,似乎还比较受学生的欢迎。

为什么要提“历史俯角”四个字?我自小喜爱阅读,尤酷爱读史,在七岁时,就开始听父亲手执线装本的《左传》为我讲“郑伯克段于鄢”等故事,往往听得眉飞色舞。小学时便囫圇吞枣地读《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书。后来断断续续像读小说般地读《战国策》、《史记》、《汉书》,进而广泛阅读并收罗些汉唐元明清的野史笔记。然后,有一天自己拥有了“二十四史”、《左传》、《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资治通鉴》。后来又拥有了范文澜、翦伯赞、周谷城等大家的“中国通史”,最后是具有研究古代文化变迁特色的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汲取了它们的丰富的营养和思考方法。然后再回头读“二十四史”的片段和《资治通鉴》时,更觉旨味醇厚,其乐无穷。可以说,我阅读古代名人名言时,都是将它们与自己的历史知

识相结合去考察、理解和取舍的。

说到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就使我想起这段忧心忡忡的文字:2011年1月9日,中科院院士汪品先教授在《文汇报》上发表《创新的障碍究竟在哪里?——致文汇报编辑部的公开信》一文谈到:“在五年前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宏伟目标。五年来,我国对科技投入的增速为全世界羡慕不已,科技成果的数量也已经名列国际前茅。但迄今为止,我们的科技发展还是以跟踪为主,原创性的成果不多,引领潮流的研究更少。一句话:发展迅速,创新不足。”接着,他又分析说:“无论解答‘李约瑟难题’(即李约翰所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笔者)还是‘钱学森之问’(即钱学森所问: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笔者),都离不开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美国院士许靖华问道:‘牛顿为什么不是中国人?’他的答案是‘儒家的“忠孝”和方块文字妨碍了创新思维’。而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以华夏古文化之辉煌而不能产生现代科学,其中确实应当有不利于创新的深层次原因。时至今日,在应试教育和对院士的炒作里,隐现着科举制度的阴影;在迷信权威、人云亦云的习气里,包含着农耕文化保守的基因。东西方文化差异是个百年话题,‘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几度起伏,其中既有把小孩和脏水一起泼掉的粗心,也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旧情。以往在战争和动乱的岁月里,对此不可能作心平气和的分析;如今的大环境已经大不相同,能不能来一次冷静的分析:我国古文化的传统中,哪些是有待继承发扬的东方优势,哪些是习以为常却应当就医的‘遗传病’?”

这其实也大致是一直萦回我的脑中反复思考的问题。自“五

四”时期以来，正是对被汉朝以后的封建王朝奉为正统思想的“孔孟之道”，开始作思想上全面清算的时期。若以黑格尔的“正反合”理论分析，正是对传统文化思想的认识，开始由“正”全面折向“反”的时期。这正合了一句话叫做“矫枉必须过正”。待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理应逐渐转向“合”的过程，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而不能达到渐行渐佳的“合”的境界。这就是汪品先教授所看到的：“‘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几度起伏，其中既有把小孩和脏水一起泼掉的粗心，也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旧情。”因此，开设课程，让大学生学习古代名人名言，在于我，也是有意为让现代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补上“合”的这一课，贡献绵薄之力。即使对选修此课的学生而言，它只是一个粗糙的开端，我也十分乐意。这里面或许维系着祖国的未来发展的远景，干系非常重大。

同样，在对于先秦诸子和古代名人名言的思考中，我感到读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最有“顿开茅塞”之效；钱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虽颇为隽永深细，然而他的《晚学盲言》中的论述，就多有不能令我赞同的地方了。深深感到，学习的过程，在任何时候与任何场合，其实都应该是批判汲取的过程；而我们拥有的法宝，就是历史辩证法。

为什么接着提“总览全局”？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大师对传统文化的阐述都有其独到之处，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大师。过去的时代虽然不能重复，各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却是能够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料作为“经纬”，来大略地感知与复制的。我们在研究各个时代的主流思想时，确实是将时代的文化大师们留下的阐述编织成一个“网络”，却还要“读懂”，并尽量“过滤”掉该时代文化大师们过分个性化的阐述，以期更真实地将时代的思想风貌重现出来。因此，“总览全局”，恰恰也是更好地为体现“历史俯角”而服务的。

因此,我认为必须将不同时代的在传统思想文化上的不同侧重点带入这门课中,在使大学生朋友们学习古代传统思想文化知识的时候,能去取自如,而不要“走火入魔”或作茧自缚,千万不能忘却滚滚向前的世界潮流以及时代赋予他们建设与创新的任務。

这里就有一个十分简单而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鲁迅与韩非打口水战?”

《韩非子·显学》有这样一段很著名的论述: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所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这里,《韩非子·显学》为我们揭示了战国末期儒、墨学派的各自分化的事实,以及儒、墨之学“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相反相成的复杂“生态”,是非常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而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篇《老庄》里,在略述周道寢衰、诸侯纷争、百家骋辩的学术思想活跃状态之后,却又有这样一段话:

然当时足称“显学”者,实止三家,曰道、曰儒、曰墨。

战国末的韩非和现代的鲁迅,在我们的心中都有着沉甸甸的分量。而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显然是从文学因素的源头的角度来论述儒、墨、道之间的差异的。于是,曾经有一个学生俏皮又委婉地问道:“韩非子说显学只有两家,鲁迅却说有三家,老师我们该信谁?”他这一问,引起了课堂的一阵骚动。

我哈哈大笑地回答他:韩非是战国末期人,自然看不到身后发生的事情;鲁迅写的则是《汉文学史纲要》,请想一想,那不完全是—码事。周室衰微,在经历春秋、战国又经过短命的秦朝,待到

楚汉相争结束之后，刘邦建汉。汉王朝到达惠帝、高后（吕雉）和“文景之治”时代，人心厌乱而思安，亟待休养生息。“垂衣裳而治天下”的黄老哲学自然而然迎合了人们的心愿。如上述韩非所述，作为一部抽象艰深的哲学著作的《老子》，在春秋、战国时期难成显学，并不使人难以理解；但是经过战国后期庄周的精妙、瑰奇的演绎，到汉初时期，老庄哲学大受追捧，而成为显学，却也是十分合理的事情。因此，读书必须将时代的因素贯穿在其中，脱离了对于时代变化的思索，很容易对所学的知识“食而不化”，使自己坠入五里雾中！

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其实时势也造就一门“显学”。比如从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到新中国的“毛时代”，我国的“显学”是深深铭刻着中国印记的，向反动派夺取政权并使国家争取独立、解放、民主与富强的战斗的马列主义学说。从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以来，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精神进一步得到发扬，我们更强调兼收并蓄，提倡了多元化思维，于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具有包容东西方经济学长处的经济学理论，成为时代的“显学”。随着我国经济的起飞，在不久的将来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科学和城市规划学，将成为新一轮的“显学”，是必然的。能否称为“显学”，关键是看这门学问本身是否真有什么恢弘的“承载力”，能托得起整个时代的人心与发展的需要而已！

因此，严格运用黑格尔的“正反合”所揭示的规律，正确地扬弃与吸收，对古代名人名言进行符合科学的、新颖的诠释，使学生们学之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便是本书所谓的“读法”；而读古人哲言，不仅要准确把握“言内之旨”，而且更追寻与时代的步伐相吻合的“言外之意”，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身既非完人，且又兼学力浅薄，笔者绝不敢冒昧自许“青年思

想导师”或者“国学学者”等等；即使在开课时，也声明只是和大学生们一起谈谈学习的体会、一起研讨，甚至不惜以自身的一些经历做例子。如今，应东方出版中心的资深编辑褚赣生先生之约，有机会将它们整理并刊印成书，心中的忐忑自不待言。此书的宗旨依然与我所开设的选修课一样，期望或许能矫正一些对于古代传统文化不正确或稍许有些偏颇的理解，并更真诚地祈求获得名家与青年学子们的批评指正。

张宗原

2012年1月16日于邀斋

前言

一边是深不可测、启人不尽遐思的历史深谷，另一边是广袤而闾寂的历史长河奔腾的波涛。我独自一个，茫然地在中间的沙溪上走着，脚下偶尔触着几块温润的鹅卵石，除此之外，只是冰凉柔软的历史沉沙……半年多来，每当我为这本书凭几搜寻、伏案迢录的时候，心中总有这种奇幻的感觉。

这不是沙里简金。捡拣的只是经过历史淘洗，犹然坚不可败的温润晶莹的鹅卵石。它们一一促使我反省自己的生命历程，生活的酸、甜、苦、辣，回味着往日的失败、舛误、幼稚、轻率、浅薄……其实都是先哲所论述过、告诫过的！心中升腾起一种岂止“从公已觉十年迟”（苏轼《次荆公》，见《东坡集》卷十四）的失落感。我深深感到，这其实是一本老少咸宜、雅俗兼顾的生存教科书。

我国的语录体文字由来已久。《论语》的师生间的随机问答可称其嚆矢，前若《老子》的断简成章，又叠梁架屋汇成文体，也似存着语录体的韵味。战国诸子囿于简牍笔削的书写方式，虽无意于语录体制，于制作中亦往往闪现颗颗哲理的珠玉。至汉代扬雄仿语录而著《法言》，语录体制遥相承袭此后；汉末徐幹撰《中论》、隋末王通的弟子捃拾先师遗训集成《中说》，或皆有《论语》的影子存在。

尤应指出的是北齐颜之推撰《家训》，虽以“整齐门内（家族），

提撕(拽着子孙的耳朵教诲)子孙”为初衷,而影响弥广,甚至为佛教僧侣广为征引。语录之体不见梁代刘勰《文心雕龙》所述,而《颜氏家训》的体裁亦只不过与语录之体差相近似而已。然佛教界对语录体之青睐或可见之于一斑。及至唐代,禅宗崛起,语录之体大行于世,皆以其接近口语,不重文藻,明白晓畅,易于流传和记忆而取之。我们无须青灯黄卷着意搜寻,即于宋代释普济的《五灯会元》稍作涉猎,那使“天花乱坠”的禅家偈语便是印证。

宋代以下,恐怕也得益于印刷术的革新,理学家几乎人人有语录之集,其甚焉者如朱熹《朱子语类》,为《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者,竟有一百四十卷之数!语录之体,因此大行。后世加以通俗化,遂有《增广贤文》、《朱柏庐治家格言》、《菜根谭》等书问世,然已与本书无涉。

本书搜罗自先秦诸子至明清之际三大家,共数十位历代哲人大贤的语录千余条,分为《树志》、《修养》、《立识》、《求学》、《读书》、《交友》、《治生》、《婚嫁》八类。凡选入者,皆求其相对完整,不割断原意,以便读者援引,并稍作简注。凡哲人小传,在该哲人第一条语录于本书中出现时,于语录后以[说明]简述之。

应该指出,先代哲人的语录,是他们在各自的时代、环境和特定的场合下产生,本身也未必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尽管经历了千百年时代的淘洗,犹然坚不可败,掷地有声,但它们并不是医治今人思想顽症和心灵创伤的万应灵丹。它们只是一面可供后人借鉴的镜子,或可资参考的古方而已。若说里面有“真金”,须得读者自行去提炼罢了。若论学习的方法,博古今,挟中西,再加实事求是的精神,才是最正确的。

谨以明代哲学家王廷相《慎言·见闻》中的语录为结束语:

君子之学,游心于造化之上,体究乎万物之实,求中正至诚之理而执之。闻也,见也,先哲也,参伍之已矣。

目 录

自序	1
前言	1
一、总述	1
二、分类读法	38
(一) 树志	38
(二) 修养	49
(三) 立识	84
(四) 求学	96
(五) 读书	114
(六) 交友	129
(七) 治生	140
(八) 婚嫁	161

一、总述

1. 由古代哲人语录引出的话题

1994年10月,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我编撰的第一本小书:《历代哲人语录》。如今在我手头只剩下一本样书了。打开,扉页上赫自写着:

前年岁末,骆师玉明兄引荐编是书。盖前曾约某学者、某博士等撰写,而有事另有他谋者。语录之体,自来不为文家所重,固已明矣,且集腋成裘,不但工程浩大,且所观之书颇伙,费力而不见其功。而余见而独喜。前读《西游记》,云孙行者入老君炉七七四十九天,将盗食之仙丹等炼成金刚不败之躯,语虽怪诞,而理颇正大。小子所以编是篇者,正有鉴于此耳!

张宗原 自藏

一九九四年十月,是年四十六

质于此,编撰这本书的目的固然在学习;其实成书之后,说起来自己对此书还是难免“粗疏”的印象,然而毕竟是自己用心用力的“第一本”,自有敝帚自珍的感觉。尔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读书中,很多原来很费解的地方,因为有了读一点“经”和儒学原著的经验而变得显豁明白了。

譬如，欧阳修《秋声赋》：“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是为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之为心。”一般的版本，在此句中别处都有注解，而唯有“天地之义气”下无注，那么，对这句话又当怎样妥帖地理解呢？

读过“经书”，解释它就不难了。汉代儒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注云：“古者书‘仪’但为‘义’，今时所谓‘义’为‘谊’。”据此，古时候仪表的“仪”，写作“义”字。因此，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义”的解释为：“己之威义也”，继承了古意。而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则说：“今仁义字用之”，“谊者，人所宜也”。

早在列为四书之一的《中庸·哀公问政》中，就有“义者宜也”的说法。南宋朱熹注此曰：“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还是唐代韩愈《原道》说得最透彻：“行而宜之之谓义。”其实上述各条中所谓“宜”，都是（所作所为）符合人情物理的意思。在旧时，这是非常普遍的常识。比如旧时人在正式场合上，都有名讳和表字，而“名”与“字”之间，意义紧相关联，比如，宋代诗人陈与义，表字“去非”，谓但凡举止言行皆去非者，其人宜也；又比如，近人傅作义将军，表字“宜生”，都是如此。

因为“义”和“宜”在现代的字义中缺乏共通性，这就是现代人对义的理解分歧很大，又往往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原因。因此，《秋声赋》里所谓“天地之义气”，可理解为：经历春、夏之后，到达秋天，即将迎来漫长的严冬，合于自然规律的、符合四时（季）之序的、行之必然（宜）之气。如果阅读过一些儒家的经典，读者自会感到这一类的文句都明白如话，确实无需加注的。

又譬如以前读苏轼《前赤壁赋》，其中有一句是在秋七月十六日的夜晚，作者和几个朋友乘舟夜游赤壁（其实是黄冈赤鼻矶）下的长江江面时，对“客”所吹奏的箫声，有颇似博喻性质的描绘：“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其中除了“如怨如慕”四字较难理解之外，其余的文字都有注解，也不甚难理解。然而笔者曾翻遍了所有的注本，偏偏“如怨如慕”四字没有加注。怎么会这样，这四字究竟应该如何解释？

细读《孟子》之后，才恍然大悟。《孟子·告子下》里有一段孟子与他的学生公孙丑关于《诗经·小雅·小弁》的问答。

《小弁》的作者是周平王姬宜臼。姬宜臼在当太子时，父亲周幽王宠爱美人褒姒，突然废黜了原配——太子宜臼的生母申后，驱逐太子宜臼，而改立褒姒为后，并以褒姒所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这样，一时间顿然使得宜臼的父爱与母爱俱失，使他格外伤心与疑惧，于是做了这首诗。诗歌讽刺了幽王的执迷不悟，斥责了馋人的阴险狡诈，表达自己极其怨抑的心情。因为在孟子的时代，有人说，《诗经》里另有一首《邶风·凯风》，写了卫国的一个妇女，一连生了七个儿子。因家境实在贫困，所以她想改嫁。她的儿子们看到因为自己而连累了家庭，以至使母亲终日劳累却无法摆脱赤贫的窘境，就做了《凯风》这样一首充满自责的诗歌。相比之下，为人子者，一个怨抑，一个自责，那些人便指斥《小弁》是“小人之诗”。于是，孟子的学生公孙丑就拿这问题向老师请教。

孟子对公孙丑解释说：父母的过失，有大过失与小过失之分。《凯风》显现的是母亲的小过失，所以子女不宜用稍许的不满去激化矛盾。愈是激怒她，母子间就愈有隔膜，儿子们也就显得愈加不孝了；而《小弁》揭示的，是父亲的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过失，父亲有了大过失而儿子不敢表达内心的怨抑，那么父子之间的亲情就会迅即荡然无存。因此，孟子断定“《小弁》之怨，亲亲（由衷地热爱与依恋自己的父母双亲）也。亲亲，仁也”，并举出孔子的话为论据：“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的意思是：大凡孩子对于父母的情结，所谓“生之膝下，一体而分，喘息呼吸，气通于亲”，是难以疏分的。当一个孩子被父母亲疏远的时候，就

必然会“怨慕号天”，这是孩子的自然本性，儒家认为这也是孝道形成的自然内因。而舜一直不被他的瞎子父亲和继母所钟爱。他们曾借舜为他们修仓库的机会，想把舜烧死在仓库里；又借舜为他们挖井的机会，试图落井下石将舜害死。当时舜已经五十岁了，事业有成，且已然声望崇高，但一旦明白父母不爱他，犹然因此而“怨慕号天”。所以孔子盛赞舜的纯孝。

可见，苏轼《前赤壁赋》里的“如怨如慕”是描写那箫声如同孩子们不被父母所爱怜时的那种悲痛绝望的心情，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至真极悲之情；其实，也只有“如怨如慕”这四字，方能妥帖地表现这种发自内心的至真极悲之情。因为这个典故出在《孟子》里，古人只要上过村塾、读过《四书》都知道，是熟典，所以一直不需要作注解。而现代人不读“经书”，不知道它的出典，就都忽略过去。甚至教大学语文的老师也各有各的讲法，变得千奇百怪了。

以上说明一个以研究我国古典文学为专业的学生，甚至是研究现、当代文学（文化）、外国文学（文化）的专业人员，无论博士生、硕士生，抑或本科生，在学习阶段，读一点经书、诸子之书与古人哲言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一个中国的专业文学研究者，最终还是主要服务于本国人民的。而一般的老百姓读一些古代的经典书籍与古人哲言，也未尝不可。

再譬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曾经援引过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一句话，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代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阶级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句话一向被有觉悟的革命者奉为行动的指南，是至理名言。

查司马迁《报任安书》里此话的本意，其实与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里的意思不尽相同。他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读《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